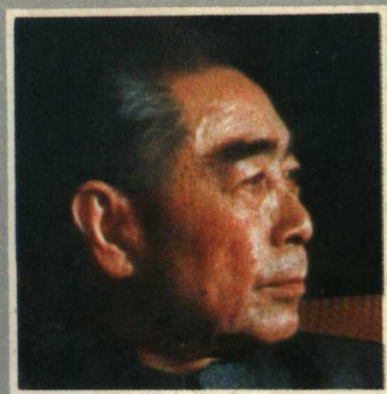


周恩來



林青·著

二十世紀

舉世聞名的

傑出政治家

ZHOUENLAI

ZAIXIAGSHENGYA

宰相生涯

周恩来宰相生涯

林 青著

长城文化出版公司

1991 · 5

周恩来宰相生涯

林 青 著

※ ※ ※

长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长城文化出版公司印刷制作

850×1168 毫米·32 开本·15 印张·350000 字

1991 年 5 月第一版 199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962-437-018-4

定价: HK \$ 30.00 元

人民币 8.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 1 章 开国兴邦 挂相印非他莫属	(3)
第 2 章 力展宏图 困惑中苦苦周旋	(26)
第 3 章 临危不变 为国家命运抗争	(59)
第 4 章 三足鼎立 护团结巧站其中	(77)
第 5 章 历尽磨难 坚韧不拔	(101)
第 6 章 天下大乱 英勇搏击	(114)
第 7 章 明保御驾 暗护忠良	(127)
第 8 章 无私奉献 高风亮节	(155)
第 9 章 接班人抢班 他激流勇进	(175)
第 10 章 副统帅谋反 他挂帅亲征	(201)
第 11 章 总书记落难 他设法搭救	(237)
第 12 章 毛夫人倒阁 他力挫狂澜	(254)
第 13 章 王洪文告状 他忍辱负重	(291)
第 14 章 四人帮窃国 他苦撑危局	(307)
第 15 章 康生抛同伙 他巧施连环	(316)

第16章	抱病奋斗	鞠躬尽瘁		(341)
第17章	岁月坎坷	血染征尘		(382)
第18章	欲上天国	忧国忧民		(450)

引子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人民最难忘的一年。

中国，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又出现了倾党倾国的政治危机。

天空，妖雾弥漫；大地，动荡不安；噩耗，接连不断。天怒人怨，人们都有一种不祥之兆：神州大地将要发生前途未卜的晴天霹雳。中国这艘失去舵手的大船，谁也无法预料它究竟要驶向何方？是凶、是吉，是祸、是福，国家、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成了未知数，人们的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数九寒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冷得令人忧郁，更加重了人们内心的压抑感。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正笼罩着美丽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

清晨，当天空还是漆黑一片之时，一个撕人心肺的噩耗，震撼了神州大地。

六时三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令人惊恐的哀乐声，播音员用低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人们震惊了。匆匆赶路的人流停止了脚步，忙碌的人们停下了手中的事，仍在熟睡的人们被惊醒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不，决不可能，他不能去世，也不应该去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这样的擎天玉柱倒了下来，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国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可怎么办呀！国家栋梁邓小平眼看就有中箭落马的危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

元这“四人帮”正虎视眈眈，箭拔弩张，阴谋接管天下。在这祸不单行的国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你与世长辞，太不是时候了。老天爷真瞎了眼。人们的心潮空前地爆炸了……

然而，当人们证实总理去世是千真万确时，犹如晴天霹雳，人人目瞪口呆，头晕目眩，不知所措。震惊、痛苦、悲哀，交织在一起，一个一个地身心变得空荡荡了。神州大地被悲痛、忧虑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立下了盖世之功，且不去说了。最令人怀念的是在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奸臣当道、忠臣遭殃的黑暗岁月，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时刻，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支撑着这所将倾的大厦。这一切，人们都历历在目，人们怎能不痛不欲生地怀念他呢？

他，人民的好总理。他是怎样走过共和国的宰相生涯，这还得要从五十年代初说起……

第一章

开国兴邦 挂相印非他莫属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当代文明时代不寻常的时刻。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近代落到任人宰割，陷入亡国灭种危机之后，终于睡醒了。

这天，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担任这个睡狮初醒的新生国家的首任总理，就是周恩来。他雄韬大略，怀着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出任共和国第一任“宰相”、总管家。他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战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

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象隐退到历史中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什么也不想解释。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

这金字塔一样无与伦比。但是，它在后来的数千年里，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算结束。

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种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的延年益寿，封建统治达数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它后来的一百几十年中，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任人割宰。辛亥革命，只是触及了它的皮毛。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入侵，又延续了几十年。多灾多难的古老的华夏民族，在这古老的大地上挣扎着。

弹指一挥间，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打下了江山，坐了天下。在这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建设天下，使百业待兴，站在第一线总指挥的，是周恩来。他不分昼夜地为国操劳着。

这年，他五十一岁，年富力强，把沉积多年的能量，一下都迸发出来。他大显了才华，博得了举国上下的尊敬和崇拜。

周恩来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周家祖籍原在浙江省绍兴县。周恩来祖父周攀龙从绍兴携家带小来到大运河边的淮安当师爷和知县。在这座有一千六百年历史的县城里，周恩来度过了童年。

他的父亲周劭纲是一个在外地谋生的小官吏。他的叔父周贻淦是四兄弟最小的一个。二十岁时患了痼病，膝下无嗣，封建迷信的家庭，信奉“冲喜”的迷信，周家安排把刚满一岁的侄子过继给小叔周贻淦。但迷信救不了小叔的命，很快地便夭折。年幼的周恩来便与年轻守寡的婶婶相依为命地生活。这样，周恩来便有了两个妈妈。养母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对古文、小说和唐诗，都喜欢阅读。她也一心想把养子教育成为一位治国安邦之人。周恩来在少年时，便会背许多古文，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

童年时代的周恩来，生活很贫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养家，只靠典当、借债和亲友接济度日。债主逼债，生母和养母忧

债交加，福无双降，祸不单行，仅在一年中，相继去世了。

十岁的周恩来，便挑起家务的重担，他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想方设法地填饱肚子。

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闹市无人问。周家兴旺时，门前车水马龙；如今家庭衰落，便门庭冷落车马稀了。眼下，只有债主临门，再也没什么人来了。幼小的周恩来开始尝到人间炎凉和辛酸了。

周恩来十二岁时，离开故乡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沈阳上小学。他没有辜负养母的辛勤培养，在第二学年时，他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感言》，赢得了老师的称赞，后来由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生学习优秀作文选发表了。

幼年时期的周恩来便早熟。这天，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

“老师！”一个学生举起手道，“我说，读书是为了光耀门庭。”

“老师，我是为家父而读书！”又一个学生站起来答道。

这功夫，老师望着周恩来说：“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读书的目的，”周恩来站起来，从容不迫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顿时，老师十分惊讶！小小的年纪，便有这样报国之心！

周恩来十五岁的时候，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此刻，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三个年头。满清王朝是被推翻了，但中国民族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劳动人民终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但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周恩来开始接受新思想。他对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他都认真地阅读。

他到南开不久，便成为学校的学生领袖。他和几位同学创办了《敬业》杂志。

不久，他从南开学校毕业了。夜茫茫，路漫漫，中国走向何方？这是一切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探索的第一个课题。

他决心去日本求学。他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凑足了路费，便东渡日本。他留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探索如何救中国。他在日本学习一年半，一九一九年四月返回祖国。

此刻的中国，就像即将要爆发的火山，民怨沸腾，随时都会发生势不可当的洪流。几个星期后，愤怒迸发了。五月四日，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打倒军阀！”“废除卖国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震撼着古老的神州大地。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几个月，便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在第一期报头印有一句英文名言作为宗旨：“民主：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我们的座右铭。”

从此，他便奋不顾身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岁的周恩来到达法国。经过“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的洗礼，他已经不是只知道猛打猛冲的青年了，而是老练成熟了。

第二年，即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周恩来在欧洲，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任第二届书记。

一九二三年，作为共产党在欧洲的喉舌——《赤光》问世了。周恩来用“伍豪”的笔名，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自己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正是在巴黎，他和年龄最小的邓小平相识了。比邓小平大六岁的周恩来，一向把邓小平当作小弟弟看待。他俩经常在一块刻蜡纸。邓小平在刻蜡纸方面很有一手，字写得很好，因此，他得了个“油印博士”的雅号。在这期间，他同留学德国的朱德结识了。朱德在国内曾经要求过入党，但没有被接

受。朱德一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恩来便欣然同意，还愿意作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共同进行北伐，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中国革命处于高潮之中。这时，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应召回国。经过四年在欧洲的工作和学习，二十六岁的周恩来，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理论思想上，都已渐渐地成熟了，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更艰巨的任务。

有非凡才华的周恩来，一回到广州，便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管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党务工作。从此，比蒋介石小十几岁的周恩来，便代表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上交道。

周恩来参与了打天下的全部活动，经过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终于打下了江山。他是共产党高级领导成员中的少有的传奇式人物。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还是在建设天下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早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便认定了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此，他便一心跟着毛泽东走。他认为只有雄韬大略而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毛泽东，才能胜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才能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扫荡中国的污泥浊水，把旧社会打它个落花流水，缔造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苦难的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自从周恩来身挂共和国的“相印”以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正在年轻的共和国全力恢复经济的时候，平地一声雷，在东方大地上，又发生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朝鲜战争爆发了。战火很快地燃烧到鸭绿江畔。咫尺之邦的中国，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派兵入朝，直接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大国短兵相接了。仅恢复经济一项，已够周恩来招架的了，现在又加上战争。他要日理万机。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中国，很明显地发生了好转，使千疮百孔的

经济，出现欣欣向荣的面貌。人民欢欣鼓舞，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来建设年轻的共和国。

正在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层里，发生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而这一事件，又直接关系到周恩来，这就是高饶反党事件。

高岗不仅资格老，也是当时颇受尊重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早在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经过十几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不久，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表扬高岗：高岗同志是正确的领导人。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环境下，能不断地前进。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又宣布，任命高岗为中共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边区书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副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东北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要职。

高岗得意忘形了。但高岗心里也清楚，名次排在他前面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等人。不论是从资历、声望和才华，他都无法和这些人相比。如果是按照自然法则，他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多只有几岁之差，等到他们腾出位置的时候，自己也到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时候了。事不宜迟，夜长梦多，要早下手。他打定了主意。

他在东北独树一帜，大造舆论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每隔一些日子，便有一篇大块文章，以高岗的名义在报纸上出现。可是，知道高岗内幕的人，却感到不仅可笑，而且十分荒唐。他还以东北的特殊“实力”作筹码，向中央讨价还价。

一九五二年国庆节时，为了显示高岗的东北“王”的权威，他擅自下令，在东北搞阅兵。在游行队伍里，有人喊出了：“高岗万岁！”“高主席万岁！”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高岗，想着昔日坐镇东北的张大帅，做着以东北实力作后盾，进驻中南海，掌握全国大

权的美梦。

高岗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即使出“清君侧”的计策。

在中央领导人之中，他感到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有两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周恩来。前者是法定的接班人，后者则掌握宰相大权。他要搬倒这两棵大树。他决定冒险“出征”。

高岗秘密地游说，首先得到实权人物林彪的共鸣。但是当他向邓小平和陈云等游说时，高岗失算了，邓小平和陈云一眼便看出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两位国家栋梁的居心。

邓、陈向中央揭发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毛泽东根据邓小平和陈云的揭发，下了决心，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出面解决高岗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把高饶反党夺权阴谋公布于众。高饶集团中的高岗，阴谋败露之后，以自杀而告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自从一九五三年起，周恩来全力以赴地抓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贫穷落后的中国，虽然解放了，但温饱问题，仍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殷切地希望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周恩来忘我地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而辛勤工作着。

时光到了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已经到了第五年了。经济建设的速度，突飞猛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这年，周恩来在总结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批评了一九五六年冒进倾向，他提出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应作适当的压缩，要保证重点，不能脑子过热。

这次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讲了话。他的话中心意思是：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

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与会者心里明镜似的，毛泽东的话，虽然说得很含糊，但他还是有所指的。他的话是冲着主管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和分工管经济工作的陈云而发的。

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论毛泽东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他只能保持沉默。他知道毛泽东的心理是急于求成，希望尽快地把中国由贫穷落后的局面，跨入先进行列。周恩来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可是浪漫主义毕竟不能代替严酷的现实，但他又不好说什么。对于建设速度问题，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现象。善于求同存异的周恩来，并没有把毛泽东的批评看得多么重。

一九五七年，在神州大地上，又发生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划了五十几万个右派分子。

这场运动，使不少人成为冤魂野鬼，就是活下来的，也背了二十几年的政治包袱、挨批、劳改和流放，几乎都走完了全过程。

这场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处于党中央第三位的周恩来，一看把一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从此打入“另册”，他思想也不通。可是，他要跟着毛泽东，所以，毛泽东作出的重大决策，他总是拥护的。

当然，他并没有直接插手这场运动，因为他专管国务院工作，一般的政治运动，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是参与了研究和决策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凡是毛泽东决定了的重大决策，周恩来就是反对也没用。他无法使毛泽东改变主意。

这年的十二月底，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同一九五二年比，工农业和人民生活，都有显著的提高。报上宣传：是政治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却促成

脑子热了，仿佛领袖、政权和党都有回天之力，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移山倒海，想做什么，都会像探囊取物那样轻而易举。客观哪，困难条件哪，都不在话下了。中国开始进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神话时代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早在一九五六年冬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对周恩来提出的要压缩基本建设计划不满，并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一年多的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周恩来的思想是保守的，落后于形势发展。他想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而周恩来主张压缩，这岂不是同自己分庭抗礼吗？

这天，毛泽东讲话了，他毫不客气地再次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他把问题提得很高，他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心里明白，这是批评自己和分管经济的陈云同志的。

夜幕降临了，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反复地思考着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莫非自己的思想，真正跟不上形势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反错了？一向严于律己的周恩来，没有往别处想，光想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自己担负的工作中找毛病。他写了书面检查，检讨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做法是错误的，表示接受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

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经济建设的思想，不仅落后发展了的形势，而且也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错误”，毛泽东是决不能容忍的。而毛泽东对别人的错误，哪怕是多年风雨同舟和情同手足的战友，也决不姑息。他也从不批评一次了事，往往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

自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对毛泽东不仅是紧跟，而且是以他十分尊重、爱戴，鞍前马后地照顾着。可是，毛

泽东并不考虑这些。他对周恩来抓住不放，而且越来越升级。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错误”；两个月之后，即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关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继续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思想。这天，毛泽东在讲话时，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思想，说这种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主张冒进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如此看重反冒进思想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批评，而且一次比一次地纲上的高，这使周恩来十分吃惊。“非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吗？反马克思主义，可以和修正主义分子与右派分子划等号了。周恩来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批评得如此严厉。他深深感到“大跃进”的形势发展太快了，自己思想确实有点跟不上。尽量跟吧！

毛泽东要把自己的“过渡”思想，付诸行动了。但在甩开膀子大干之前，他也先从舆论造起。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周恩来的保守思想，就是在高级领导层中扫除思想上的障碍。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一些农村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毛泽东一句话，全国农村都闻风而动，一哄而上。顷刻，在神州大地的农村，都挂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千军万马的大兵团的作战方式，一下在农村铺开了。“共产主义”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打破了社界、乡界、县界。几万人在一块地里打“歼灭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欢马叫。仿佛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开什么庆祝大会似的。

整个农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大办学校，大扫文盲，大搞卫生，大除“四害”，大搞科学，大搞技术改革，大搞献资献宝，大炼钢铁……粮食一年翻番，铁加番。钢铁元帅升帐，